

文峰塔映  
◎李斌

## 我的小学

◎习肆

我小学读了两所学校。一年级开始我读的是一所村小,叫港北小学,因村子南边有一条相对比较宽阔的河流叫滥港河而得名。学校差不多坐落在村子几何中心的位置,孩子上学不论从哪个方向去,走的路都差不多。学校有个四五亩地的样子,三排平房,没有围墙。两排朝南,一排朝东,三排房子中间有块空地,是上体育课的地方,也是孩子们课间追打嬉闹的乐园。第一排朝南和朝东的房子都是草房,墙是刷的白色石灰,屋顶虽然是稻草,却铺得整整齐齐,北边朝南的房子建设的年代稍微晚些,是砖瓦房,红色砖头顶上盖着红色洋瓦。

第一排房子紧贴着村中心路,共有五间,中间一间较小,是老师们的办公室,其余四间是教室,我上课就在其中一间。路上,村民们来来往往,我们坐在教室里都能看到,孩子们做作业时,老师有时会倚在门口和路过的熟人聊上几句,说话的内容我们能听得清清楚楚,但似乎没什么影响,我们照样认真地各自写着作业。一年级时,我的父母跑亲戚经过学校门口,看着他们逐渐远去的身影,实在控制不住,便从教室里追了出去,哭着闹着要跟了去,最终还是被训斥着交回老师手里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村小条件十分简陋。教室里只有简易课桌,没有凳子,凳子是学生自己带过去的。那时,村里每家每户只要有孩子上学都得请木匠打一张一人坐的条凳,和家里常用的条凳比,高度差不多,长度只有一半。打扫卫生时,把凳子摆在课桌上,高矮胖瘦

长短品相各不相同。每到开学第一天,我们就背着书包、扛着自家的条凳去上学,在田间劳作的村民们看到了就会说一声“日子过得快哩,又开学了”。不像现在的孩子念书,人手一只保温杯,我那个时候不记得在学校里喝过水,早晨出去只有中午回家才有水喝。但夏天不一样,夏天出汗多,嘴容易干,父母会给我们一分钱,这样就可以喝上醋茶。所谓醋茶,就是井水里面添加从小卖部零买的一分钱的醋。盛水用的“茶壶”是我们自制的,找来挂水用剩下来的玻璃盐水瓶子,在橡皮塞子上面钻一个洞,再找根废旧电线,把里头的铜丝拉出来,拉铜丝的过程一般比较艰难,两只手摩擦生热相当烫手,剩下的空心皮线就成了吸管,插到盐水瓶子里。有时为了方便还在盐水瓶口上系一根带子,背在身上,吸管可根据自己的身高规划它的长度,一头插在瓶子里,一头叼到嘴里,一边跑一边吸,相当美味且有范儿。有的家庭条件更差,连一分钱的醋钱也舍不得给孩子,看到别人吸醋茶,他们眼中充满羡慕神情。关系好的小伙伴就会把皮线塞他嘴里,给他吸上几口。

二年级时,我们移到了北边那间瓦房,瓦房毕竟是晚盖的,宽敞明亮,教室里四排学生,两排是二年级,两排是一年级。老师采取复式教学,上半节给一年级孩子讲课,二年级的学生自己看书做作业,下半节给二年级讲课。我做作业一贯出手较快,作业做完了顺带听听一年级的课。一年级的课程毕竟熟悉,老师提问时常抢先插话回答,被老师教育了好几回。批评归批

评,老师心里还是很喜欢我的。有一次,老师准备给一年级孩子讲一道数学题,她看我闲着,便点了名叫我去讲。我讲完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,成功当了一回“小老师”,心里美滋滋的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时的老师大多是代课老师,本身也没多高学历,但他们朴素的教育理念放在现在来看仍是先进的,他们懂得用爱和激励浇灌一个孩子的成长。

三年级时,政府对教育资源进行优化整合,港北小学被拆并,学生根据距离远近被一分为二,分流到邻近的另外两个村小,我选择了离我家相对较近的东边的柏树墩小学,说是近,但还是比原来的学校远了很多,每天跑四趟,总量有个十里地的样子。那时农村还没电视机,我家里有台收音机。我每天中午都要收听11:50的评书,路途远了之后,中午放学需要一路奔跑才能勉强赶上。那时的我们在户外的时间多、走的路也多,所以同学里面没有一个小胖墩儿、小眼镜儿。

学校拆并,老师们也随之分流。我村里的吴老师也一起分到了柏树墩小学。有天中午,我和同学们使劲跑着,背后有人呼唤我名字,原来是吴老师骑着自行车从后面过来。他叫我搭乘他的自行车,坐在他的车后座上,我把他夹在后座上的报纸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上,回头得意地望了望被甩在后面的同学们。

小学时光已经远去,虽然那个时代条件很艰苦,但那段与老师同学们朝夕相处、质朴平凡的童年经历永远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美好的回忆。

就像濠河的微波  
——略忆黄步千先生

◎杨谔



说他正为一些中青年作家出版作品介绍出版社,有意无意地用了“推出”“提携”两个词,黎化先生对此十分敏感,一双镶嵌在重枣一般脸上的小眼睛不紧不慢地刮了一下步千先生,含义丰富。步千先生似乎浑不在意,滔滔依旧。黎化先生便把话题扯到了我的身上,说对我了解不多,听到过别人对我的书法的评价,说好说坏的都有。

南通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,从事文学创作的本事多是从生活中“一刀一枪”拼杀得来的。他们各自拥有一套感受世界、表现世界的方式,风格各异,有坚固的内核。老作家们生活学习能力强,兴趣广泛,比如黄步千先生,除文学外,对于地方文化及书画艺术都有较深的涉猎。同行的队伍中,供职于《江海晚报》的诗人李军先生对我的篆刻颇感兴趣,认为应该要早些为人所知,他当即决定以后晚报每周至少刊发我的篆刻作品一次,连刊半年以上。那天,步千先生在一旁“助兴”说,由他写一篇分析我的篆刻的文章交晚报发表。回通后,步千先生即来找我,很认真地问:“篆刻也讲意境吗?”我说:“当然!”“那我知道该怎么写了。”篆刻艺术意境的问题历来关注者甚少,我是经他这么一问之后才开始真正重视起来的。他第二天就完成了写作,文章充满了新鲜的感觉。

步千先生住在城南小区,楼下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菜场。我常从启秀花园出发,经南大街,再穿过该菜场到光明东村自家开的小公司上班。喜欢站在楼上观察芸芸众生的步千先生在之后碰到我时多次说:某月某日某时,你穿什么衣服,买了什么菜等等。家常里透着关切。渐渐地,我与他变得熟络起来,我敢没大没小地和他开玩笑,他也不计较,甚至故意用玩笑的方式回敬,让气氛变得更为“放肆”。有两次,他还带着他的新媳妇巧儿,抱着孙女来我家小坐,我们两家还一起吃过一两次简单的饭。

他曾请我陪他去通州拜访作家张黎化,我与黎化先生的交往就自此开始。那时,黎化先生的长篇小说《江海祭》刚出版,好评如潮。黎化先生春风得意,蓄足了劲要冲刺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闲谈中,步千先生

回顾与步千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,我找不到一句可以代表概括他思想高度的“口头禅”,也讲不出一个可以证明他“非凡”的故事,就像我们看惯了的濠河,一年四季,微波荡漾。步千先生是千万个濠河儿女中平常而又独特的一个,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他在人群中无声微笑,却不能接受他如今的遽然永逝!